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亚历山大远征记

〔古希腊〕阿里安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亚历山大远征记

〔古希腊〕阿里安 著

〔英〕E.伊利斐·罗布逊 英译

李活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历山大远征记/(古希腊)阿里安著;李活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分科本. 历史、
地理类)

ISBN 978-7-100-13275-6

I. ①亚… II. ①阿… ②李… III. ①亚历山大大
帝(前 356—前 323)—生平事迹 ②古希腊—历史 IV.
①K835.407=2 ②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2894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亚历山大远征记

[古希腊]阿里安 著

[英]E. 伊利夫·罗布逊 英译

李 活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275-6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3/4

定价: 45.00 元

Arrian

ANABASIS ALEXANDR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 Ltd.

1929

本书译自英国伦敦罗布古典图书出版社 1929 年英译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序 言

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在古代流传下来的几种有关亚历山大的著作中，是比较好的一种。

阿里安自己说，他写《远征记》所用的资料，最主要地来自托勒密·索特的作品。托勒密是亚历山大部下重要将领，他的作品是以亚历山大的“起居注”(Ephemerides，作者欧迈尼斯〔Eumenes〕，于普鲁塔克之《希腊罗马名人传》及奈波斯之《外邦名将传》中皆有传)、有关军政文书及其亲历所记为依据的。所以，尽管托勒密对亚历山大及自己均不免有粉饰之处，阿里安对托勒密的迷信也是错误的，但与一些侧重传闻的著作相比，阿里安的著作是比较有根据的。

阿里安较少记载亚历山大的奇闻轶事，注意避免那些对亚历山大的夸张不实、附会溢美之词。他也没有像“逍遥学派”和一般“斯多噶派”学者(虽然他本人在哲学上也属于“斯多噶派”)那样一味痛斥亚历山大为暴君或把亚历山大的胜利说成是靠好运气取得的。阿里安主要用意在于表彰亚历山大的所谓“勋业”，甚至以此作为写作目的(见本书卷一 7)，不过他对亚历山大的某些行为也表示异议(见本书卷三 18、卷四 7、卷四 12 等)。所以，尽管阿里安并不能对亚历山大作出确当的评介，但他总是力图避免虚构并对



历史取分析态度的。

阿里安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多发议论,把主要笔墨用于记述行军作战的进程,不过,他相当善于通过事件描写人物的性格,在一些重要地方又借用历史人物之口表达出对于问题的分析和概括(见本书卷一 18、卷二 7、卷七 9—10 等),收到了寓论断于叙事的效果。

阿里安拘于写亚历山大,所记自亚历山大即位始至他去世终;又拘于写远征,故所记以军事为主,而忽略了战争双方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诸条件。这样就使人很难看出亚历山大的东侵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发生的,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获胜的。阿里安从历史舞台上抽去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背景,于是剩下的主要就是“英雄”的意志和才能对于懦夫庸人的胜利。结果,他不用夸张笔法就夸张了亚历山大,真正实现了他对自己提出的宣扬亚历山大“勋业”的要求。不过,阿里安也没有把亚历山大当作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完美人物。他在叙述亚历山大酒后怒杀功臣的时候,说亚历山大未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成个“怒与醉二恶的奴隶”(见本书卷四 9)。他还破例叙述了亚历山大与一些遁世主义者交往的轶事,企图说明亚历山大能战胜敌人而不能战胜自己的欲望,而那些所谓能战胜自己欲望的人却是亚历山大所无法战胜的(见本书卷七 1—2)。这些都是他在历史领域内重复或运用他的老师埃皮基泰图斯(Epictetus)的哲学见解(见阿里安编:《师门述闻》卷四 1)。以“斯多噶派”的没落悲观的眼光观察野心勃勃的亚历山大,这是他没有更多地肯定亚历山大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阿里安所写的亚历山大远征放到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来理解。希腊自公元前五世纪初叶打败波斯侵略以后,就不断蓄意东侵。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奴隶制城邦发生危机,各邦更加企图以东侵来缓和自己的危机;可是,由于各邦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原先居于领导地位的斯巴达、雅典等邦的势力也在长期争霸战争中日趋陵夷,希腊已经无力实行它所企求的东侵。这时,原来处于落后状态的马其顿迅速兴起。这个新兴的奴隶制国家对希腊各邦虎视眈眈,对波斯帝国更馋涎欲滴。希腊奴隶主阶级对于正在兴起的马其顿霸权有两种态度,如雅典就有以德谟斯提尼为首的反马其顿派和以伊索克拉特为首的亲马其顿派。伊索克拉特在他许多作品中都表示希望马其顿率领希腊各邦东侵,德谟斯提尼同样也表示“我承认,他(指波斯皇帝)是一切希腊人的公敌”。(见其关于改革海军的演说《论西摩里亚》3—4)所以,希腊奴隶主阶级在反对波斯和主张东侵这一点上的根本意见是一致的。亚历山大禀受了马其顿新兴奴隶主阶级野心勃勃的侵略性,代表了全希腊奴隶主阶级东侵的意志,接受了希腊与波斯长期斗争的经验,采用了希腊的先进军事技术(如方阵等),终于率领一支不很大的马其顿和希腊人队伍征服了巨大而衰朽的波斯帝国。当时,马其顿和希腊的历史需要一柄“利剑”;亚历山大在马其顿的“野蛮”性格和希腊人的“文明”精神熏陶下,被铸成了这样一柄“利剑”(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亚历山大传》卷四至卷十)。马克思说:“希腊内部极盛时代是伯利克里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13页)希腊的外部极盛时代,就是通过这个带有偶然性的亚历山大而必然地到来的。

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卷八 1—17)中叙述了印度河流



域和恒河流域的一些情况。西方史家最早说到“印度”的是希罗多德(见卷三,98—106),他的资料来自波斯人的传闻,所记仅限于印度河流域,而且其中海客谈瀛洲式的内容也不少。阿里安所记,则主要以亚历山大水军大将尼阿卡斯和塞琉古王国驻孔雀王朝使节米伽西尼斯的作品为依据。这两个人有些亲身经历,后者还曾到过恒河流域,他们所记一般自然比希罗多德信而有征。他们的原作早已失传,阿里安以及斯特拉波等人的著作中保存了他们作品的许多内容,这对于研究南亚次大陆古代的历史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必须指出以下两点。第一,阿里安引用米伽西尼斯的说法,认为当时整个印度地区都没有奴隶(见本书卷八 11),而当地各种传说的文献都证明奴隶制确实是存在的。曾随亚历山大远征并在印度河里为亚历山大坐舟掌舵的欧奈西克瑞塔斯也曾说印度河流域某些地方是有奴隶(见斯特拉波《地理学》卷十五)。亚历山大本人就曾经把印度河流域一些起义城市的居民卖为奴隶(见本书卷六 17)。这些情况说明,米伽西尼斯也许是把某些地方的现象当作了整个地区的现象,也许是囿于希腊人的成见而发生误解。总之,他的结论是错误的。第二,阿里安引用了米伽西尼斯的七种姓的说法(见本书卷八 11),而当地各种传统的文献都把基本种姓列为四种。在这一点上,他的说法也是不合实际的。

刘家和

1978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导言	1
----	---

亚历山大远征记

卷一	13
卷二	58
卷三	95
卷四	137
卷五	180
卷六	218
卷七	255
卷八(印度)	295

附图

亚历山大远征图	340 页后
尼阿卡斯由印度河至底格里斯河航行路线图	340 页后

索引	341
----	-----



导 言^①

本书正文系以笛杜所编杜勃纳抄本为依据，而杜勃纳抄本是以巴黎手抄本为依据的。前者一般简称 A 抄本，后者简称 B 抄本。B 抄本，即十五世纪巴黎古抄本(1753 格令)和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稿本(一般简称 C 稿本)，几乎可以肯定是直接根据 A 抄本原稿而来。而且因为其脱漏(卷七 12.7)实际上是 A 抄本的一整页，所以罗斯认为 A 抄本是最原始的抄本。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A 抄本，即十二世纪或十三世纪初的温杜包尼西斯古抄本，后曾有人校正，于是又产生了 A² 抄本，或称 K 抄本，亦即格罗诺的“最好的佛罗伦萨古抄本”，这个抄本杜勃纳也曾利用，他极重视 B 和 K 两种抄本的一致。由于纸页散失或毁损，A 抄本有脱漏；而所谓“第二批”手抄本一般也有许多小脱漏。因此，只有将 B、C 及 K(由 A² 而来)合并使用，才可避免脱漏(只有卷七中的共同漏页除外)。

A 和 B 两种抄本的《印度》一卷最好。阿里安企图仿效希罗多德的格调，这是值得赞赏的，但有时也有错。

因此，编辑《远征记》的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

① 这篇导言是罗布(Loeb)出版社某编辑写的。二篇都未署名。——译者



可以忽视通常的校订方法。应当指出,编者往往发生一些偏向,其中有两个是主要的:其一是,尽量使阿里安“典范化”,这是很自然的。阿里安的时态往往不合规则,已完成的动作他常用未完成时;他的介词有时用得很奇怪,甚至用 $\kappa\alpha\tau\alpha$ 表示“上溯”^①,他的 $\tau\epsilon$ 和 $\gamma\epsilon$ 用得不是地方,而且 $\delta\epsilon$ 也不是经常和它的 $\mu\acute{\epsilon}\nu$ 一致。克勒格和辛提尼斯为了纠正他这些错误下过很大工夫。他们所以这样校订的基本思想是,他们认为希腊人一贯运用他们完美的语言工具。此外,阿里安还常常为了把话说明白,写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复的字句。这样就形成了大批“相同的语尾”,于是有时造成混乱(参见卷一〔十二〕),有时容易使人怀疑有遗漏——尽管这些遗漏一般都是很小的。由于他的 $\tau\epsilon$ 和 $\mu\acute{\epsilon}\nu$ ^② 和一般用法不同,也引起同样的怀疑。总的说来,我反对编者在原著中插入一些语句,我更完全反对任何“典范化”的倾向。如上所述,B、C 和 K 三种稿本结合使用,已可以避免“第二批”抄本中的许多脱漏。在缺少 A 抄本的情况下,我们改用和它相同的 A² 抄本(即 K 稿本)与 B 抄本,加上 L 稿本(十五世纪劳润田抄本,据罗斯说,它是“第二批”手抄本中最好的代表本),就不致发生错误。诚然,我曾尽量利用罗斯的考证材料(1907 年小杜卜诺编)。不过,他有些建议虽然很有意思,但根据罗斯本人对抄本的估价看来,并不是有必要的,因此我并未采用。对专名的各种变异(除所指系不同的人之外——如卷四〔十九〕2、〔二十一〕1、〔二十二〕1)也是这样。对苏伊达斯和攸斯塔西

① 卷二(一)3。——罗布出版社编者

② 参见卷一(七)2。——罗布出版社编者

亚斯提供的证据,对在坡利欧塞提卡发现的不一致的材料(卷二〔十五〕和〔二十五〕,围攻提尔和加沙)我照例也都未采用。再者,字形的准确当然是重要的,但当人们无法断定的地方(例如卷一〔二十一〕⁴关于 ἡρίφθη 和 ἡρείφθη),而且译文也并非不自然时,我都未离开手抄本。因此,阿里安的去完成时就成了愿意打笔墨官司的人们争论的重点。不过,不论科伯特还是洛伯克,除了说阿里安应当这样或那样写之外,并未给我们更能令人信服的东西。此外,至少有一个专名的写法也弄错了(卷二〔十二〕²里的 πολυσπέρχων),还有些人的父亲的名字不对,有些历史和地理情况的解释也有错误。这些错看来属于阿里安的,并不是抄稿的人抄错的。抄稿的人也偶尔把数字抄错(如卷二〔二十七〕³)。

谁想得到整个考证资料,就可以参考罗斯整理的那些。我在这里特地对他表示感谢。他的考证(包括波拉克的考证)中具有扎实的、而且往往是高明的见解。但由于这样的校订本是不可能翻译的,至少是很难翻译的,而阿里安这本“远征记”在校订艺术方面也并不是引人入胜的,也只得以此这个不完整、不准确的形式问世。

我只对卷一(一)段 6 节提出了我个人的意见。

版本、译本及其他

《远征记》的版本,除格罗诺版本外,还有阿比其特 1875 和 1889 年版本,克勒格 1835 年版本,辛提尼斯 1867 年版本,罗斯(小杜卜诺编)1907 年版本。H. W. 奥顿(布莱克伍德)还编写了卷一、二的学生版(1902 年),否则,这么有意思的一位名家就没有



学生版。秦诺克(E. J.)的《远征记》和《印度》译本,附有一些有用的注释,但现已绝版。在巴黎出版的一套很好的名著(原文和译文,G. 布德学会编)中,也有《印度》这一部。

在J. W. 麦克润德所著《古印度史》五卷中,大段大段地摘录了《远征记》和《印度》中的文字,译文很好。还可参见《剑桥古代史》卷六(W. W. 塔恩著)、《剑桥印度史》以及《英国历史杂志》1896年十月号中白尔汉姆的文章。在一般学术杂志和年鉴中,阿里安不大引起学者注意。近年出版的卜西安年鉴只提到几句。《希腊研究杂志》近几年来有过一些有意思的摘要(W. W. 塔恩在48期〔2〕,L. R. 太勒在47期〔1〕和48期〔1〕有一篇叫“波斯王的精灵”;A. D. 诺克在48期〔1〕有一篇文章,探讨亚历山大以前的“对统治者的崇拜”即关于“匍匐礼”的问题。这下子当然引起了争论。但我们可以怀疑,就连亚历山大本人也不见得很明白这种事会招致什么后果,或可能招致什么后果)。关于阿里安著作一般是否可靠的问题,在这些文章里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阿里安(Flavus Arrianus)

阿里安一生的经历比较简单。他是希腊人,约于公元96年出生于尼考米地亚。因此,当哈德良、安敦尼·庇护和马可·奥理略^①在位时,正是他在世的时期。哈德良曾委任他为卡帕多西亚总督(公元131—137年)。对一个希腊人来说,这个职位已是最高

^① 他们都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时希腊已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译者



的荣誉。147 年他在雅典当执政官。大约死于 180 年。由于他曾在部队服役过,所以写这部远征记还是一位行家。作为艾皮克提塔斯^①的学生,他曾把老师的讲话记录下来编写成书,即《师门述闻》。在他的老师的学说方面,他算是一位重要权威。

他写的这部亚历山大历史的价值取决于当时的官方史料是否准确。而官方史料是否准确这个问题却是无法解决的(正像 W. W. 塔恩在《剑桥古代史》卷六中指出的那样)。因为阿里安并不隐瞒他写的这部书是以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二人的记述作为主要的依据。关于前者,他还曾天真地说出他的看法,认为托勒密作为国王不至于说谎;甚至还说,托勒密写书时亚历山大已经死去,他再吹拍谄媚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阿里安这个看法只能说明他尊敬帝王,也许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同时也说明他缺乏批判精神。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把他自己在远征中扮演的角色加以美化,满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马哈菲在他的《希腊生活和思想》第 205 页上说:“在托勒密的记述中……很明显,他对自己的成就毫不挑剔,也毫不遗漏。”在同页的脚注中还补充说:“作为一位作家,托勒密(苏特)的命运是稀奇古怪的。一方面有阿里安夸奖他的《亚历山大回忆录》是一部最严肃、最真实的著作;另一方面,有人杜撰了一些故事,冒用卡利西尼斯^②的名义发表,后来在书前还加上托勒密的名字。而且,在 C. 米勒所著《伪卡利西尼斯考》一书的序言第 27 页上,还有一位中世纪的读者写的一首讽刺短诗,

① 约公元 55—135 年,雅典斯多噶学派(禁欲主义)哲学家。——译者

② 亚历山大的随军御史,朝廷大事和远征情况都由他编写。——译者



描绘托勒密的无知和欺诈。”

托勒密究竟是不是一只寻觅狮子吃剩的残肉碎骨以果腹的豺狼，我们可以先不去管它，也可以认为中世纪那些讽刺短诗不足为凭；但问题并非就此结束。假如说托勒密所记述的亚历山大的进军和胜利应是准确的官方史书的话，那么，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是否仍然是准确的呢？而阿里安写的历史显然是以托勒密作为主要的根据。

读者对这个问题将有机会得出自己的看法。因为在阿里安的著作中，读者可以读到他那些小小的自我流露和他自己发表的意见。当他感到义不容辞时，他能毫无顾忌地对亚历山大本人进行严厉的批评，这是值得赞扬的。在军事方面，虽然他有些专长，而且把亚历山大惯常的军事调度写得很清楚，但一出现不平常的情况，他写的东西就有些含糊不清。一般说来，他写的历史还是读得下去的，只是有些单调沉闷。但当他根据两种或更多的史料编写时，往往不能把它们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当然，这是古代史作家的通病。

他对亚历山大一生中那些浪漫主义色彩的东西，大部分都清醒地避开了。考虑到这么伟大的军事业绩只有少得可怜的文献记录时，他这样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亚历山大的部队、战术和 阿里安的术语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亚历山大的战术属于最简单的一类，但颇

